论北宋熙宁时期改革思潮下的士人心态与政见之争

袁　辉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摘　要：熙宁时期是北宋政治文化演进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士人心态主要围绕着庆历、嘉祐以来改革思潮的风起云涌而得以展现。新旧两党虽各有分属，但其改变赵宋王朝积弊丛生局面的初衷与诉求是一致的，并着力阐明各自对于变法的政治主张，尤其是围绕着祖宗家法变与不变的问题产生了激烈的政争。这一时期的政争从性质上而言仍是基于国是的不同政见之争，在心态上虽时常不免夹杂意气成分，但从根本上区别于其后元祐以降政争的恩怨化倾向，主要体现为新法推行前后士人群体在“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驱使下改革理念与政治理想的分歧与差异。

关键词：熙丰新法；改革思潮；士人心态；新旧党争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5）03-0092-09

收稿日期：2025-03-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BZW097）：政治文化视域下的北宋士人心态与文学演进研究。

作者简介：袁　辉（1985-），男，山东聊城人，聊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5.03.010

自真宗朝中后期到庆历时期，随着士人主体意识的萌发与觉醒，他们对于社会历史的使命感与担当感也得以空前强化，当这种思想心态的变化遭遇到宋初以来由于治政重心偏移与士风循谨持重所导致的日益冗困的现实局势，改革便成为势所必然，成为接下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政治主题。适如葛兆光先生所论：“变革在当时已经是士大夫中的共识，无论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在朝或不在朝，得势或失势，从庆历以来这种思潮始终存在于士大夫中，并主导着社会的舆论”①。然而庆历时期的改革从性质上而言尚局限在新旧两种政风士风的冲突与碰撞之上。尽管“本朝之治，独与三代同风”的政治理想已由庆历士人开启，并被后世视作“祖宗之家法”②，但彼时尚仅限于蓝图式的规划与设想，除了将整顿吏治作为首要的变革主张外，并未针对社会历史问题提出真正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真正的践行则始自熙丰之际，而基于共治意识所形成的“共定国是”观念也成为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士大夫群体与皇帝之间所共同认可与遵循的治政原则，“这是北宋政治史上一项具有突破性的大原则”③。

尽管积弊丛生，险境重重，但这一代士人却以一往无前的政治勇气与责任担当，将曾经仅存在于观念中的构想与期待付诸变革现实的努力，也对既有的权力格局构成了一次颇具冲击的挑战。虽说这次宏大的政治实验以失败告终，并引发了迁延日久愈演愈烈的新旧党争，对于其间的成败得失，后世评述亦多，但群体心态的差异与个体心态的转易乃至二者之间的交错，仍然为我们在回望这段历史时指向了一个更为广阔深远的反思空间。

一、常患法之不变：庆历、嘉祐以来北宋士人的改革愿景

治平四年（1067）正月神宗即位，北宋政治秩序的建构在历经百余年探索与涵蕴之后，大体进入到范

①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66 页。

②[宋]李心传著，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下册，第 545 页。

③余英时先生将接续仁宗之世而来的熙宁变法视作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演进的第二个重要阶段，是回望三代的政治理想由“‘坐而言’转入‘起而行’的阶段”，认为该阶段是“士大夫作为政治主体在权力世界正式发挥功能的时期。”参见余英时著：《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自序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年，第 8 页。

型确立的时期。韩琦、欧阳修与富弼等昔日庆历新政的中坚，到了这一时期作为两朝乃至三朝顾命大臣，虽然忧国之初心未曾稍改[①]，但整体对于改革的态度却日趋保守。其之所重，虽犹在纪纲法度，但又无不与赵宋家法紧相关联。因此，当韩琦入对求罢，神宗欲以时任翰林学士的王安石代之，得到的却是韩琦“安石为翰林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②]的回应。随着年齿渐长、尤其是数十年政治经验的切身体察，他们整体上已不复昔日立朝之际抗庭直谏、奋励谠论的慷慨锐气。如熙宁元年（1068），神宗问及边事，富弼对曰：“愿二十年口不言兵”[③]，且以九事为戒。这种姿态不仅受到欧阳修“至作相乃一切坚守、无所施为为是”[④]的指摘，连神宗也认为他“自为相，一无施为，惟知求去”。[⑤] 到了南宋，朱熹针对此种现象更加毫不客气地指出：“仁宗用韩、范、富诸公，是甚次第，只为小人所害。及韩、富再当国，前日事都忘了。富公一向畏事，只是要看经念佛。”[⑥] 从深层次上来看，这番情形的出现其实是政治形势、心态变化与思想差异等复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不宜直以畏事惧祸视之，更与宋初士人施政作风的因循惰怠有着本质不同。尽管其间各人的心理动因不一，但从欧阳修的话中，我们犹可一窥端倪：“大抵时多喜于新奇，则独思守拙。众方兴于功利，则苟欲寻常。”[⑦] 也就是他们从主观上不愿循于流俗。然而无论如何，这样的政治姿态也许能见容于仁厚宽简的仁宗，但却很难与“有气性，好改作”[⑧]的神宗在政治步履上合拍，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如果说身处濮议风波中的英宗尚因身份问题而心存顾忌的话，那么宋神宗则以父终子及之正统足堪担负起改作天下的责任。因此，年轻的神宗表面上虽依然尊视诸位顾命大臣，但在内心又绝不甘框限于他们为治道所进行的谋划，而是有着更为宏大的雄图远略。于是，君臣遇合，风云际会，重又上演于北宋波澜壮阔的历史帷幕。

尽管随着庆历士人晚景的心态转变，似乎朝政重又为保守势力所掌握，但在仁宗朝成长起来的士大夫对于变革的群体诉求已经汇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对于熙、丰时期愈益高涨的变法呼声，朱熹曾认为“只是当时非独荆公要如此，诸贤都有变更意。”[⑨] 所以，在韩琦、富弼等昔日的新政中坚转趋保守之时，这种变革的重任便由王安石等新一代士人承担起来。

嘉祐四年（1059），时任三司度支判官的王安石在向仁宗所上万言书中，历陈其法先王之政的改易更革之道，尤其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⑩]的治政取向，已体现出与范仲淹诸人在改革方向上的显著差异。在后之所作《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中，他又进一步将理财视作治国安政的当务之急，并对当时三司副使“守成法，吝出入，以从有司之事而已”[⑪]的现状表示了不满与忧虑，就中所展示出的俨然是一位改革家的政治立场，与当时守成惜位的为政逻辑形成鲜明的对照。嘉祐六年（1061），王安石又呈《上时政疏》，提出“盖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进而明确了以“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询考贤才、修明法度的改革主张，并认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⑫]。但王安石在仁宗朝晚期的这些

---

①如欧阳修“事有不可，修未尝不力争”，面对台谏官论事，他同样“直前折其短”，参见［宋］徐自明著，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册，第357页。又如韩琦“其心常系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笃，虽病不忘国家。或有时闻更祖宗一法度，坏朝廷一纪纲，则泣血终日不食”。参见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一，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册，第371页。此处所及，皆就其晚年居处高位时的状态而言。

②［清］黄以周等辑注，顾吉辰点校：《长编资治通鉴拾补》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册，第59页。

③［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十八《富郑公神道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册，第525页。

④［宋］叶适著：《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下册，第718页。

⑤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七，第2册，第404页。

⑥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七，第2册，第404页。

⑦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七，第2册，第358页。

⑧［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三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册，第3111页。

⑨［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三〇，第3111页。

⑩［宋］王安石撰：《临川先生文集》卷三九《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17页。

⑪［宋］王安石撰：《临川先生文集》卷八二《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第861页。

⑫［宋］王安石撰：《临川先生文集》卷三九《上时政疏》，第423-424页。

政治主张，就具体措置而言，仍然处于发轫阶段，尚未涉及有关祖宗家法改易的制度层面，故能得到大多数士人的认同与响应。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强烈的改革期许，不仅体现在其后熙丰变法的主持者王安石及其拥护者身上，也是一些庆历旧臣与新法反对者司马光，以及中间立场者如苏轼兄弟等人一贯的政治立场。

张方平在仁宗朝即对范仲淹主导的新政多所不满，嗣后又反对、攻击熙丰新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改革本身的抗拒。庆历时期他便屡番上疏，痛斥三冗之弊，其间亦多涉理财之方。张方平向以论兵著称，其之所论也往往出自对民瘼的关切，如所呈《上仁宗论民力大困起于兵多》，又是对冗兵现象的揭批。其间无不透出对更张法度的期许。这种期许也延续到神宗朝，在呈奏的《上神宗论国计》中，针对当世的伤财害民之举，他主张“为制度而节之”，反对“遵守常故”[①]，体现出明确的变革意向。

嘉祐年间，以起居舍人同知谏院的司马光先后进呈《陈三德上殿札子》《上谨习疏》《论财利疏》等章奏，从不同侧面探寻更革之方，阐论理国之道。如在《论财利疏》中即针对官冗兵众、粮费库耗等弊政，勉励仁宗“安得熟视而无所变更邪”[②]，可见其改革之心的迫切。嘉祐六年（1061），司马光深怀忧思惕慎之心向仁宗奏呈《进五规状》，从“保业”“惜时”“远谋”“重微”“务实”五个方面阐发其政治主张，不仅寄寓了他对太平之世表象下潜藏的诸多不平之状的种种忧念，还提出了“谨守祖宗之成法”的“守邦之要道，当世之切务”[③]，期待仁宗能够振作有为，以保国之太平久远。

此时，已于文坛稍显峥嵘的苏轼兄弟也积极倡言革弊之论。嘉祐五年（1060），苏轼在制科考试前献策、论五十篇于知谏院杨畋以及宰辅富弼等人，苏辙献二十五篇，皆就社会各方面的痼疾阐明自己的改革举措。如苏轼提出的“安万民”与“厚货财”以及“定军制”与“倡勇敢”等主张，涉及到财政、政治及军事等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李覯谓“二十五策，霆轰风飞，震伏天下，非真有道者，安能卓荦如此”。[④] 可见苏轼在撰作姿态上也是意气鼓荡、恣肆纵横。在南宋朱熹看来，这些举措的提出，无不是“煞要整理蔽坏处”。[⑤] 不过苏轼又将当今之患，天下之失的根源归为“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⑥] 这时的苏轼，虽尚难避免对于政局认知的固有局限，但毕竟体现了他对于改革风潮的热衷与呼应。苏辙也曾在嘉祐六年（1061）的《上昭文富丞相书》中表达了“不于其强壮闲暇之时，早有所发明以自致其志，而复何事”[⑦] 的政治抱负，结合他此前所献策论，可知其志之所向，同样在变革求治。

作为北宋道学发展关捩的二程兄弟，同样对变革抱有充分的热情。程颢的《论王霸札子》《论十事札子》[⑧] 以及程颐的《上仁宗皇帝书》[⑨] 等，也都从不同方面表明了自身的政治立场与改革倾向。

可见，嘉祐年间，尽管新政已随着范仲淹等人的出请外任渐趋落潮，但适如南宋陈亮所论：“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及熙宁、元丰之际，则又以变法为患。”[⑩] 尽管熙丰时期的情形有所变化，但这一时期，无论是王安石、司马光还是尚未显名于政坛的苏氏兄弟以及潜心于洛学的程氏兄弟，无不体现出鲜明而强烈的变革意志，其背后则是庆历以来“以天下为己任”的主体意识在士人群体中全面而集中的承继与发扬，这也许比具体措置的成败与否更能彰显庆历时期新政本身的价值与光彩。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

①[宋]赵汝愚编，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宋朝诸臣奏议》卷一〇二《上神宗论国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下册，第1097-1098页。

②[宋]司马光著，李文泽、霞绍晖点校：《司马光集》卷二三《论财利疏》，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册，第622页。

③[宋]司马光著，李文泽、霞绍晖点校：《司马光集》卷一八《进五规状》，第1册，第537页。

④[宋]李覯著，王国轩校点：《李覯集》卷二七《上苏祠部书》，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97页。

⑤[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三〇，第3100页。

⑥[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八《策略三》，第232页。

⑦[宋]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卷二二《上昭文富丞相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上册，第479页。

⑧[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上册，第450、452页。

⑨[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卷五，上册，第510页。

⑩[宋]陈亮著，邓广铭点校：《陈亮集》卷十二《铨选资格》，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上册，第134页。

面对积弊愈趋丛生的国势，在熙丰变法之前，王安石的变革理想还是得到了诸多满怀着忧患、使命与期许的士人的拥护，甚至连其后与之水火不容的司马光也谓：

> 向者与介甫议论朝廷事，数相违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于光向慕之心，未始变移也。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①

就中可见，尽管政见数相违戾，但司马光对王安石治政之能的赞许却并非客气话，而是由衷倾慕，并进而对其寄予“太平立致”之厚望。这在当时也并非司马光一人之见。“天下盛推王安石，以为必可致太平”②“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不作执政为屈”③，从这些话语中，我们不难感受到，王安石出相是众望所归，公议所向。

自仁宗朝起，公议成为新型政治秩序构建过程中一种重要的舆论制约，尽管其后由于台谏系统的集体失语等因素，导致公议的公信程度有所下降，但它依然以或显或隐的方式深刻地影响着其后两宋政治文化演进的制度化历程。王安石自步入政坛起，便始终以改革家的身份出现于当日乃至后世的历史评说中。因此，自嘉祐、治平以降，对王安石的推崇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当时士论对改革积弊、扭转国势的群体诉求与内在共识。从中可以看出，由熙、丰新法产生的新旧两派的政见之争起初便与庆历新政中两种不同政风、士风间的冲突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其焦点并不在于改革本身，而是围绕改革本身所形成与主张的不同路径与理念，新旧两派士人在政治心态上的差异也主要基于这种分歧。④

二、先王之政与祖宗休烈：熙宁时期新旧两派士人的政见分歧

熙宁二年（1069）二月，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随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指挥变革的常设派出机构，由王安石与知枢密院陈升之总领其事。

在新法施行之初或稍前一段时期，王安石一方面认为“除弊兴利，非合众智则不能尽天下之理”⑤，另一方面又对当时舒缓萎靡的政局与因循畏慎的士风有着深切的体察。嘉祐初年，刘敞曾就李仲昌议开六漯河而以赃败致书任职于馆阁的王安石，相戏以晋人王衍事，且谓“不与世事可也”。后者径以“天下之事，所以易坏而难合者，正以诸贤‘无意’，如鄙宗夷甫也”⑥之语，对包含刘敞在内的“诸贤”不以经世为念，惟以希位为图的因循作风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经过濮议风波之后，王安石曾以皇伯之说的“悖理伤教”与台谏吕诲等人发生冲突，甚至招致吕诲诸如“大奸似忠，大诈似信”“误天下苍生，必斯人矣”⑦之类的恶语相加，从而使得他与台谏之间的关系也渐趋

---

①[宋]司马光著，李文泽、霞绍晖点校：《司马光集》卷六〇《与王介甫书》，第2册，第1255页。

②[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三，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2册，第451页。

③[宋]马永卿辑，[明]王崇庆解：《元城语录解》卷上，北京：中华书局，《丛书集成》本，1939年，第9页。

④针对王安石执政以前以及新法施行后所遭受到的来自于反对派的各种非难，罗家祥认为，传统“变法派和反变法派之争的焦点不是要不要变法，而是如何变法”的观点“亦应进一步商榷”。并进一步从王安石鄙视老成、擢用后进、台谏病态发展三方面因素分析两派纷争的原因。（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54页）此说颇有道理，但主要着眼于王安石与仁宗朝后期以来反对者的关系及各自立场而言。事实上，这种关系到了熙丰时期又有所变化，发展为以王安石与司马光为核心的两大政治集团在政见上的差异与分歧，根本上仍是围绕祖宗之法产生的如何变革的问题，这一点从二程、二苏兄弟反对王安石的言论中也可以得到相应印证。如其后朱熹所言：“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先生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三〇，第8册，第3097页）况且仁宗朝后期乃至新法议定之前，王安石与司马光的私交整体而言也还是相对和缓甚至彼此相善的。

⑤[清]黄以周等辑注，顾吉辰点校：《长编资治通鉴洽补》卷四，熙宁二年三月乙酉条，第1册，第169页。

⑥[宋]魏泰著，李裕民点校：《东轩笔录》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8页。

⑦[宋]赵汝愚编，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宋朝诸臣奏议》卷一〇九《上神宗论王安石奸诈十事》，下册，第1180-1182页。

疏离，况且台谏系统自仁宗朝后期起便已有畸形发展的趋势，唯以讦人为能。[①] 王安石对于台谏的不满也并非始于此间。嘉祐六年（1061），时任同修起居注的王安石即代表舍人院向宋仁宗进言：

> 臣等窃观陛下自近岁以来，举天下之事属之七八大臣，天下初以翕然幸其有为，能救一切之弊。然而方今大臣之弱者，则不敢为陛下守法以忤谏官、御史，而专为持禄保位之谋；大臣之强者，则挟圣旨造法令，恣行所欲，不择义之是非，而谏官、御史亦无敢忤其意者。陛下方且深拱渊默，两听其所为而无所问。安有朝廷如此而能旷日持久而无乱者乎？[②]

王安石对于台谏系统已日益显露的持禄保位、希风承旨之风深表忧虑。在濮议风波中，台谏更是堪为皇伯说与皇考说两派交争的始作俑者，同时也对嗣后王安石主持变法前后所遭受的无名非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有这些表现都使得王安石对于台谏系统功能的异化不能不存有特定的隐忧与戒备，况且舆论的围攻在其入职翰林之前即已开启。表面上看虽然得到了“性气越紧，尤欲更新”[③] 的神宗的支持，但王安石心中非常清楚这种支持在朝野内外的非议之音仍甚嚣尘上的情形下其实是有限度、有条件的。

众所周知，王安石变法的基本宗旨是除弊兴利，富国强兵。在施政之初，这种不恤流言、一往无前的开拓精神又包含着感遇君恩的心理：“相熙宁，神祖虚心以听，荆公自以为遭遇不世出之主，展尽底蕴，欲成致君之业，顾谓君不尧舜，世不三代，不止也。”[④] 但随着变法舆论环境的变化与自身倔强性情的驱使，他专断独决的一面也愈益显现。在供职翰林、入主中书之际，他便逐谏官中丞，以减少异论，为即将开始的变法清路。“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务，而宿望旧人议论不协，荆公遂选用新进，待以不次，故一时政事，不日皆举，而两禁、台阁、内外要权。莫匪新进之士也。”[⑤] 与之相应，对于一些颇具资历却怠于政事的旧臣却不与其事。熙宁二年（1069），同知枢密院范纯仁论奏王安石罪状，其中一条即是“鄙老成为因循之人”[⑥]。其中所针对的正是王安石对待两类官员的不同态度。

熙宁二年（1069），富弼罢相，荐文彦博以代，未蒙神宗许可。富、文二人，皆是当时不务改作的旧臣典型。而被司马光认为“老成有人望”的富弼，在王安石眼中却是“一切合流俗，以为声名而已”，而“若用其智略，无以过人”[⑦]。故此显然难以为用，这也招致了富弼的嫌恶。当然，王安石所针对的并非富弼一人，而是以之为代表恪守成规、老成因循的士人群体。他曾在给司马光的信中说：“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⑧] 可见当日政坛风气所向。王安石对于韩琦、欧阳修等也多有不满，认为“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尤恶纲纪立，风俗变”[⑨]。王安石虽然尊敬欧阳修，亦曾以师礼事之，但却很难认同其晚年急流勇退、志在归田的政治立场。其间的分歧，较之前此不同士风间的碰撞，更多地还是体现在两代士人在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上的差异。因此，王安石要着力改变这种现状，就势必重新擢用一批认同自己的政治理念同时又具有开拓品格、富于进取精神的青年才俊，从而也进一步加剧了新旧两派之间的冲突。如熙宁六年（1073）八月，翰林学士承旨韩维在诏体问行户投行利害一事上就认为“今于此小事处置关防，乃不得与新进小生为比，臣复何面目出入禁闱，恳求去位”[⑩]。通过主动求罢来维护自己作为一位“行年六十”的老臣的最后一丝体面。司马光亦曾毫不留情地指责王安石在用人上“苟为己尽力，则因而

---

①对于王安石在濮议中与台谏之间的观念差异以及随之而来的怨怒，相关分析可参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第63-66页。

②[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三，嘉祐六年六月戊寅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册，第4678页。

③[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三〇，第8册，第3095页。

④[宋]岳珂著，吴企明点校：《桯史》卷十一“王荆公”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7页。

⑤[宋]魏泰著，李裕民点校：《东轩笔录》卷五，第57页。

⑥[宋]杨仲良撰：《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八《吕诲劾王安石》，《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86册，第489页。

⑦[宋]徐自明著，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七，第2册，第404页。

⑧[宋]王安石撰：《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三《答司马谏议书》，第773页。

⑨[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四，熙宁四年六月甲子条，第9册，第5449页。

⑩[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二，熙宁七年四月己卯条，第10册，第6157页。

进擢；或小有忤意，则夺借官而斥之”[①] 的倾向。不仅如此，一些旧党士人甚至抬出作为两宋政治最高准则的祖宗家法进行不遗余力的抵制，如文彦博即以“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②] 等作为反对新法的强力理由。这也是变法派与反变法派在表面上难以调和的分歧核心所在。

应当说，入朝之初的王安石对于祖宗家法之成制虽尚未有所逾越，但已经体现出自己基于特定时势感受的独特体察与考量。如熙宁元年（1068）四月，越次入对的新除翰林学士王安石面对神宗“方今治当何先”的问询，从容以“以择术为始”应之，并谓：

> 道有升降，处今之世，恐须每事以尧、舜为法。尧、舜所为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士大夫不能通知圣人之道。故常以尧、舜为高而不可及，不知圣人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也。

这种观念得到了神宗认可：“卿可悉意辅朕，庶几同济此道。”[③] 但紧接着他又向王安石抛出了此问题的另一方面，即祖宗天下何以百年无大变者所倚何道，王安石遂进呈著名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痛斥“一切因循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④] 的怠惰政风与苟且士风，并将之视作“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重又向神宗表达了冲破旧罟，力行改作的坚定信念。但这一点遭到司马光等人的激烈反对。在昔日嘉祐年间，司马光即曾立足于“天地不易也，日月无变也，万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的观念认为“道何为而独变哉”[⑤]，从而主张祖宗之法应当“世世相承，无有穷期”[⑥]。到了熙宁二年（1069）八月，司马光进《体要疏》，深怀“披肝沥胆，以效其区区之忠”之心向神宗历陈治道之方，认为“为政有体，治世有要”，明确表示“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上下相维，内外相制，若网之有纲，丝之有纪”，这里指陈的纲纪，正是就祖宗家法而言。因为“祖宗创业垂统，为后世法”，自可统御内外，保国之太平久远。可见与王安石一样，司马光虽同样主张法度纪纲，但他所要维护的还是谨守祖宗成宪，以为改革张本。也正因此，司马光在用人上，乃以“不须才智，但令谨朴小心不为过斯可矣”[⑦] 为准的。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二者在对待变法态度上的差异。在新法推行之初，司马光还屡次致书王安石，争言其之不便，但其所反对者，并非改革本身，而是难以容忍王安石打着先王旗号所行的变道之举。司马光的政治立场不仅得到韩维、吕公著、文彦博等旧派官僚的呼应，也同样为其身为处士的洛阳故交邵雍所认同。所谓“遂令高卧人，欹枕看儿戏”[⑧]，这位有着宏阔历史视野的理学家也很难对新法的前景抱有乐观态度。在《邵氏闻见录》卷十九还曾记载着一个神奇传说：治平年间，邵雍散步天津桥上，以杜鹃声惨然不乐，有客问其故，答曰：“不三五年，上用南士为相，多引南人，专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矣。”[⑨] 故事本身也许不无附会，但邵雍对待新法的态度大体还是明确的。

当然，这种态度也得到了新党士人针锋相对的还击。熙宁四年（1071），一批旧党士人相继离朝，御史中丞杨绘藉此上疏神宗，抨击新法用人问题。王安石以础基梁栋为喻，谓“基能承础，础能承梁，梁能承栋，乃成室，以粪壤为基，烂石为础，朽木为柱与梁，则室坏矣。”[⑩] 表面上虽是就杨绘所言年齿而发，根本上仍是治国理念与改革思想的差异与分歧。

---

①[宋]司马光著，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09页。

②[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熙宁四年三月戊子条，第9册，第5370页。

③[清]黄以周等辑注，顾吉辰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上，第1册，第93页。

④[宋]王安石撰：《临川先生文集》卷四一《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第446页。

⑤[宋]司马光著，李文泽、霞绍辉点校：《司马光集》卷七四《辨庸》，第3册，第1504页。

⑥[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四，嘉祐六年八月丁卯条，第8册，第4704页。

⑦[清]黄以周等辑注，顾吉辰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一，治平四年七月壬午条，第1册，第32页。

⑧[宋]邵伯温著，李剑雄、刘德权点校：《邵氏闻见录》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23页。

⑨[宋]邵伯温著，李剑雄、刘德权点校：《邵氏闻见录》卷十九，第214页。

⑩[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四，熙宁四年六月甲子条，第9册，第5449-5450页。

作为王安石在熙丰新法中最为得力的助手，吕惠卿在其眼中是一位当世少有的“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①]的人才，而吕氏本人的政治观念与变革主张也多与王安石一致，故颇蒙其垂青而委以重任。吕惠卿在王安石论议新法之初，即给予其最大限度的理解与支持，成为王安石坚定的政治盟友，而绝非出于依附之念。王安石自江宁还朝后便屡次向神宗举荐吕惠卿，并且“事无大小必与之谋”。王安石擢相，推行变法后，又推荐吕惠卿任条例司检详文字，当时青苗、助役、水利、均输之政，“一时奏请，皆惠卿发之”[②]，可见其倚重程度之深，以至“时人号安石为‘孔子’，惠卿为‘颜子’”[③]，二人关系之紧密若是，大致仍基于在政治立场上的志同道合。因此，包括均输、青苗、募役等诸法在内的新法的制订与颁行，吕惠卿无不亲预其中，其后又兼判司农寺，成为变法运动的重要推动者。[④] 在熙宁二年（1069）的时候，司马光曾借为神宗读《资治通鉴》之机，以汉代曹参尊萧何故规事对新法进行讽谕，重申其“祖宗旧法，何可变也”的思想，吕惠卿则以“以弊则必变，安得坐视其弊而不变耶”[⑤]予以针锋相对。这既是对司马光恪守祖法的驳辩，从而有力地呼应了王安石法先王之政的改革精神。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王安石在推行新法过程中所呈露出的执拗与倔强的政治性格，尤其是就中所体现出的独断与专行，同样对吕惠卿产生了长远的影响。邵雍曾谓“安石、惠卿本以势利合，势利相敌，将自为仇矣”[⑥]。这也成为元丰年间新法风向转变以及王、吕关系出现裂痕的重要诱因。

三、出入之间的选择：基于改革理念与新法施行的政见倾向

对于熙宁时期由于新旧两派士人在政治立场以及治政路径上的分化所形成的分歧，葛兆光先生认为“尽管从庆历新政到熙宁变法，只不过是这种思潮（按：指变革思潮）的自然延伸，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士大夫的取向与策略却在熙宁年间发生了相当戏剧性的变化，虽然一批士大夫沿袭着庆历以来的思路，倾向于采取激烈的实用策略，在皇帝的支持下进行变革实验”，但还有一批士大夫“似乎更趋向于采取一种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与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立场，试图通过文化传统的重建，借助道德理性的力量，确立知识与思想以及它的承担者在秩序中的规训意义，并进而以温和的渐进方式清理并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⑦]。在对造成这种“戏剧性的变化”的原因进行更深层次的思想史背景追问时，葛兆光先生给出的结论是“‘道统’与‘政统’的分离”。[⑧] 也就是在政见之争背后所彰显的其实还是思想之争。表面上看，两派交争似乎呈现出针锋相对、水火难容之势，然而就实际而言，在新旧两派歧异之间，还有一部分士人，尽管在立场上各有分属，但相对而言在对待新法态度上却实际体现出一定的务实倾向，而并非全然以派系之属站在彼此的对立面。“法之初行，异论纷纷，始终以为可行者，吕惠卿、曾布也；始终以为不可行者，司马光也。余人则一出焉，一入焉。”[⑨] 这里所道出的，其实正是熙宁时期新旧两党在对待新法问题上的实际情形。也就是当时卷入熙丰新法的大部分士人都有过在出入之间徘徊往还的心路历程，其间的分合乃至交锋又大多基于各自不同的思想立场、变革理念、政治理想以及对新法施行效果的切身感受。

苏轼在神宗即位前后的政治态度也是主张变革，期有所为，但随着新法的渐次开展，与苏轼心目中的改革设想也渐行渐远。叶梦得《石林诗话》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

---

①[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七一《吕惠卿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9册，第13706页。

②[宋]徐自明著，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八，第2册，第438页。

③[清]毕沅撰：《续资治通鉴》卷六六，熙宁二年二月甲子条，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4册，第1635页。

④[清]黄以周等辑注，顾吉辰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熙宁二年二月甲子条，第157页。

⑤[清]黄以周等辑注，顾吉辰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六，熙宁二年十一月庚辰条，第1册，第259-261页。

⑥[宋]徐自明著，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八，第2册，第439页。

⑦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166页。

⑧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167页。

⑨[宋]王称撰，孙言诚、崔国光点校：《东都事略》卷九五，《二十五别史》，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14册，第818页。

熙宁初，时论既不一，士大夫好恶纷然，同在馆阁，未尝有所向背。时子瞻数上书论天下事，退而与宾客言，亦多以时事为讥诮。同极以为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听也。①

与文同的无所向背相比，熙宁初年苏轼的峥嵘外显，多出自对王朝积弊重重的深切忧患，其后新法推行，苏轼又是从生民疾苦的立场对其中的一些举措表达自己的不满，故常与王安石议论相左。因此，“凡荆公所变革者，初时东坡亦欲为之。及见荆公做得纷扰狼狈，遂不复言，却去攻他”②。这种“尽底翻转”③的前后转变，体现的正是王、苏二人在深层改革理念与政治理想上的差异。无独有偶，元祐年间，司马光还朝施行“更化”，要尽废新法时，苏轼再次明确表示反对。也就是说，作为旧党成员的苏轼对于新法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熙宁年间辗转诸地方官任的他对于相关措施是否能够于民有利的切身感受，并在元祐之后出现了一些转变，而并非单纯新旧两党分属的政治立场。

熙宁三年（1070）闰九月，曾巩移知沧州，过阙上奏，在文中他既反对“踵袭卑近、因于世俗”，主张“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绝之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为其任在己”“变易因循，号令必信”，并指称当日形势为“斟酌损益，革弊兴坏，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备”，但同时又极力颂扬本朝“继一祖四宗之绪，推而大之，可谓至矣。”④ 可见，曾巩也在致力于弥合先王法度与祖宗之制对于当世之务所共同具有的重要价值，体现出调和二者的政治倾向。

张载作为关学的创立者，青年时即喜论兵，后在范仲淹的劝诫下推求儒家经义，遂以经世为己任，密切关注着社会时势的发展。在对待改革的问题上，他与王安石的意见相左，但又不截然反对新法。“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见，论治人先务，未始不以经界为急，讲求法制，粲然备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举而措之尔。”⑤ 这其中同样包含着张载本人对于北宋政治发展到熙宁时期所日渐呈露的因循之弊、冗费之政的现实感受与政治取向。

整体而言，赵宋王朝祖宗家法的最初确立主要基于制衡维稳，防弊杜患的现实考量。但北宋政治发展到熙宁前后，社会形势与民族关系等领域所发生的诸多深刻变化，使得祖宗法制在整体导向上的局限性日益凸显，由防微杜渐到积弊丛生，适如神宗所言“天下弊事甚多，不可不革”⑥，这既是时论共识，同时也构成了王安石以“祖宗不足法”的无畏精神推动变法的内在理路。但正是由于对北宋政治文化核心要素的触动，才引起同时代诸多士人的激烈反对，也更加彰显出熙丰新法改易更革的坚定决心与原初精神。入京前的王安石曾多年为官于地方，积累起一定的改革经验，这也为他其后以循名责实的改革立场主持熙丰新法，促成祖宗休烈向先王之政的蓝图转变，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与实践基础，其间蕴含了他作为一代政治改革家的风范由生成、发展再到凝定的演变过程。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祖宗之法发展到神宗朝，大体上已经得以确立，但其并非具体的制度规约，更倾向于特定治世原则与施政理念的规划与呈现，本身就具备一定的灵活性与变动性。事实上，祖宗之法与通变观念并非截然对立的两种准则。其二是尽管王安石在熙丰新法中有“尽取祖宗法度纷更之”⑦的一面，但诚如邓小南先生所论“力图突破祖宗法度束缚的王安石，对于祖宗之法中注重制衡、防患于未然的原则精神，实际上持有一定的认同态度。”因此，熙丰新法中的王安石，虽然大倡先王之政，但又“并非完全站在祖宗法度的对立方面，但他也从不将祖宗法度理想化。”⑧ 因此，作为赵宋王朝最高的治政准则，在熙宁时期随着改革思潮的风起云涌所带来的诸派纷争中，不同政见之间的碰撞与交锋，虽然时常打着祖宗

---

①[宋]叶梦得著，逯铭昕校注：《石林诗话校注》卷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92页。

②[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三〇，第8册，第3101页。

③[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三〇，第8册，第3101页。

④[宋]曾巩撰，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卷三十《移沧州过阙上殿劄子》，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下册，第442页。

⑤[宋]吕大临撰：《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宋]张载撰，章锡琛点校：《张载集》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84页。

⑥[清]毕沅撰：《续资治通鉴》卷六六，熙宁元年二月乙卯条，第4册，第1617页。

⑦[宋]徐自明著，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七，第2册，第403页。

⑧邓小南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441页。

家法的旗号，但从根本上而言还是不同政治群体在治道理念、改革立场与政治理想上的差异与分歧。

结　语

总体而言，熙宁时期的士人心态主要藉由北宋中叶以来改革思潮激荡下所形成的政见之争得以呈现。此间的政见之争虽未免时常含有意气的成分，但整体导向大体仍是围绕着新旧两派士人对于改革不同立场的坚守而展开。因此这一时期随着新法推行而触发的新旧党争大多基于国是，尤其体现为祖宗家法更张与否与具体改革实施路径上的分歧，而尚未及北宋后期以倾轧异己为目的的恩怨之争的层面。较之前此之庆历新政，改革作为具有强烈主体性与时代性的现实诉求已经成为熙宁士人的一种共识与自觉，但随着祖宗家法对这一时期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内在影响的不断深化与巩固，其与王朝积弊丛生的贫弱局势之间的矛盾也日渐突出，从而也就愈加激发了自庆历以来在士大夫群体中所发扬起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主体意识。如何调整恪守祖宗成法与实现改革理想之间的平衡，成为摆在这一代士大夫群体面前的重要使命。当这样一种以救弊与经世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心态投射到文学领域中的时候，也就使得熙宁文学的论政色彩愈益浓厚。无论是王安石的诗歌，苏轼的政论还是司马光的史论，都从不同角度与侧面形成了对这一时期特定政治文化的有力回应。伴随熙丰新法在神宗主导下的渐次施行与王安石相权意志的强化，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大多被排挤出朝，台谏也得以重新改组，新法在王安石的主持下进入一个平稳施行的阶段。但平稳的表象却依然潜涌着一股暗流，并深刻影响着整个熙、丰时代政治文化的走向与士人心态的转变。

The Scholars' Mentality and Dispute of Political Views under the Reform Ideologies in the Xining Period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YUAN Hui

(School of Literature,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Abstract: Xining period is an important stage of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Scholars'Mentality mainly was manifested around the upsurge of reform ideologies in the social level since the Qingli and Jiayou period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Renzong. Although the New Policy Group and the Old Policy Group had different political positions, they had the same expectation to change the various abuses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y made great efforts to clarify their political opinions on the reform of the new policies especially around the issue of the change and unchanging of the Imperial Ancestors' Instructions of Song Dynasty. The dispute of political struggles in this period was still essentially a dispute on national affairs. Although they are often mixed with emotional elements in their mentality, they ar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enmity tendency after Yuanyou period. The dispute of political struggles in Xining period was mainly reflected the different of reform ideas and political ideals drivened by the mission of "taking the world as their own duty".

Key words: the new policies of Xifeng; reform ideologie; Scholars'Mentality; struggles of New Policy Group and Old Policy Group

[责任编辑　唐音]